

从西方哲学 到禅佛教

傅伟勋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 019 5079 0

海外学人丛书

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

傅伟勋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海外学人丛书

责任编辑：冬 晓

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

CONG XIFANG ZHAXUE DAO CHANFOJIAO

傅伟勋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75印张 348,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定价7.30元

ISBN7-108-00062-8/B·23

编 序

本书作者傅伟勋现任美国费城(州立)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宗教系佛学与远东思想教授,十六年来主持该系研究所东方哲学与宗教部门的博士班。一九三三年十月,他生在我国台湾省新竹市,曾先后在台湾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等校的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专攻近现代西方哲学,而在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以英国分析伦理学与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比较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一九七一年应聘转到天普大学主持博士班研究之前,曾在台湾大学、伊利诺大学及俄亥俄大学的哲学系执教西方哲学、佛教哲学与中日思想。

据纽约《(中国)时报周刊》(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的人物报道,傅教授“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中,研究领域最广、语言工具最为齐备、训练最为完整的学者之一。……他兼通中、英、日、德四种语言,并均可用于学术讨论及写作。他在二十年前出版了中文《西洋哲学史》(台北,现已八版),二十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是台湾在这一领域里重要的教科书之一。最近傅伟勋又出版了两册中文《哲学与宗教》论文集,第一集定名为《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二集为《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两册凡八百页逾五十万言。另外傅氏还与韦政通教授合力主编中文《世界哲学家丛书》,预计百册以上。在英文著述方面,傅伟勋以马列主义、中国哲学与佛学名世。他所主编的《战后世界宗教运动及其争端》二大册,由美国国会资料供应中心之一的绿木出版

社 (Greenwood Press) 印行。另外，瑞士的国际出版公司‘彼得朗’ (Peter Lang) 最近也延请傅氏出任《亚洲思想文化 (Asian Thought and Culture) 丛书》主编，这项丛书主旨是在奖掖青年学者出版学术专著，其规模之宏大，为国际出版界近年所少见。傅教授表示，如果华裔青年学者有博士论文或专著待出版，只要题目与内容合于所求，他将尽力协助，使新生代及早发表研究成果。”傅氏近又应有关出版公司延约主编《亚洲哲学宗教思想丛书》，首批十三卷，重点在阐述中国、印度和日本之传统思想。每册篇幅在打字稿600—800页之间。

本书便是上述《哲学与宗教》第一集的全部与第二集第一部 (中国思想文化继承课题·中精选数篇所辑成的，内容正如书名所示，包括英国经验论、存在主义 亦译实存主义)、儒家思想 (尤其心性论) 乃至道家哲学与禅佛教的新探等等。首篇《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可以看成作者的哲学自传，简述自己钻研中西哲学的主体性历程。他在开场白说：“我的甘苦经验对于立志以哲学探求为己任的年轻一代或有切磋琢磨、抛砖引玉的教育意义。”

傅教授还出版过英文《中国哲学指导》(美国 G. K. Hall 出版公司) 等书，且在年内将继续出版《哲学与宗教》第三集与第四集，书名分别题为《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与《从大乘佛学到创造的诠释学》，仍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另外他已开始为此公司筹划五十巨册以上的一套《世界思想文化史丛书》，并担任主编。同时，他也兼任三种英文学术性期刊的编辑 (皆系美国发行)，以及台北两大中文杂志《文星》与《当代》的编辑顾问，在期刊杂志方面有他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去年四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邀请傅教授访问讲学，他在该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江

苏省社会科学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分别就大乘佛学、中国思想文化继承课题、哲学方法论、中西哲学的交流会通等题演讲多次，甚获嘉评。一九八七年年初，他在纽约的中文季刊《知识分子》(冬季号)发表了长篇《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后记》，报道他首次访问中国并作学术演讲的大致经过。

这一年来傅教授正式提议并促进海峡两岸之间非政治性的学术文化交流，首先倡导“文化中国与中华文化”的时代意义。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二日，他在台北耕莘文教院大讲堂作了一次“文化中国与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的公开演讲，演讲稿在《文星》杂志三月号正式刊载，据说引起台湾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应。台北的《新新闻周刊》创刊号(三月号)就载有该刊编辑部的一篇《大陆“登陆”台湾？》，文中特别提到，“最近这一两年，大陆和台湾的实质关系愈来愈增，而且渐渐由地下转到地上。上个月(即元月)，目前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傅伟勋教授正式提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主张。……著名的画家兼艺评家何怀硕有一句话颇能感动人心：‘政治是短暂的，文化才是长久的。台湾的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看什么书、看什么画，人们的这种文化人权不容被政治污染。’他引申傅伟勋教授的见解，认为台湾有必要找学者专家来研究海峡两岸学术文化的问题。”

为了促进关于“文化中国”的共识共认，傅教授又参与《文星》杂志的“五四专辑”筹划，为此向中国大陆学者代为邀稿，有十多位撰稿响应。《文星》今年五月号正式发表了《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的新作《科学：文化研究中被忽略的主题》，算是一项有关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历史性突破。“五四专辑”的最后一篇是傅教授的自作《中国文化往何处去？——一个宏观的哲学反思与建议》。他在前言中写道：“去年(一九八六)十二

月间，我自美飞抵台北，与《文星》杂志发行人萧孟能先生见面时，他谈起为纪念‘五四’，拟做一个有关海峡两岸的文化专辑，我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后来我想出以‘文化中国与中华文化’ (Cultural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为此专辑的主题，萧先生拍案叫绝，盖此主题摄有字语倒转的一对重要名词，能兼涵当前海峡两岸之间非政治性或超政治性的文化线索，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赓续发展双层意义。‘文化中国’指谓贯通海峡两岸的横面线索，警告我们文化断层可能造成‘永别’危机；‘中国文化’则指绵延流长的文化纵层，提醒我们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容任意割断。纵横双层合起来说，乃意味着：‘中国目前虽仍处于“一分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都应具有“文化中国”的共识共认，为了祖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继往开来承担一份责任’。”最后一句是从傅教授为他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所自撰的总序结语引用出来的。

《文星》五月号除了“文化中国与中华文化”的专辑之外，又设特辑“不死的理想主义者”，首次在台湾分期连载刘青峰（笔名靳凡）一九八〇年曾在北京《十月》文学杂志发表过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并附有两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便是傅教授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靳凡〈公开的情书〉解说》，又有刘青峰应傅教授之请，专为《文星》撰写的《致台湾的读者们》，也算是海峡两岸纯文艺交流的一项突破。《文星》六月号连载《公开的情书》之外，继续刊登了十多位中国大陆学者特约新稿之中的两篇，即三联书店特约编审金春峰的《五四文化讨论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俊民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反思——谈中国学者的现代思考》，似已引起台湾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注目。我们特别指出此一事实，藉以表示

我们对于海外华裔学者傅教授依据“文化中国”的着想，倡导海峡两岸之间学术文化交流所费心思的极大敬意。

一九八七年五月初，傅教授又应邀再度访问北京，而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文化书院、北大、人大、南大、杭大、武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学术单位进行演讲或座谈十余次，其中有关“文化中国与中华文化”的演讲特别引起国内教授学者与大学生们的关注，听众的反应异常热烈，也对台湾的知识分子有关“文化中国”与“文化断层”的反思增加了有益的了解。我们现在重印傅教授在台北出版的新著，也可以说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之间学术文化交流所作的一个响应。

一九八七年八月

目 录

编序	1
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	1
英国经验论基本问题之剖析与批评	55
西方二元论世界观的崩落与实存主义 义的兴起	157
杞尔克葛人生三阶段说释义	167
沙特的存在主义思想论评	179
美国近年来的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 重建问题	203
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上)	239
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下)	265
胡适、铃木大拙与禅宗真髓	297
如净和尚与道元禅师——从中国禅到 日本禅	325
(禅)佛教、心理分析与实存分析	347
老庄、郭象与禅宗——禅道哲理联贯 性的诠释学试探	381
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	419
——关于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问答	
儒家思想的时代课题及其解决线索	437
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哲学省察	471
——从生命的十大层面与价值取向谈起	

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

一、代 序

去年(一九八二)七月初旬曾去母校夏威夷大学参加陈荣捷教授所主持的国际朱子学会议，前后十天，将近百位学者来自世界各地，济济一堂。开会前夕，在东西文化中心餐厅得与闻名已久的韦政通兄初次见面。政通与我又在开会期间聚餐痛饮、促膝畅谈多次，结为良友，算是个人参加此次大会的最大收获之一。惜别之后我们常以书信联络，交换心得。政通亦曾寄赠《中国论坛》半月刊两次，这才知悉台湾已有如此相当水准的刊物。他在去年十二月初的书函，盼我能够忙里抽闲写出几篇文章出来，登在中国论坛。最近我对他表示，一有空暇甚愿先写两姊妹篇《西方哲学的挑激与中国哲学的回应》与《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分从哲学探求的客观性课题与主体性历程的两个侧面公开个人多年来钻研中西哲学的一些经验谈。政通体谅我在美国教学繁忙，劝我先就主体性历程撰写《荆棘之路》。我就借此机会谈谈三十年来研讨哲学的种种个人体验，希望不久再写客观性课题的另一姊妹篇，也刊登在《中国论坛》。

近代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曾描写他本人哲学探求的艰苦历程为一条“荆棘之路”。任何读过他那划时代的三大批判书以及其他重要论著的哲学同行，都不得不点头同意康德此语恰

当不过。我们可以说，哲学探求本来就是荆棘之路，毫无捷径可言。《论语·泰伯篇》曾子有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们如改“仁”字为“哲学探求”四字，曾子此语的内涵可以扩充而为“哲学探求是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荆棘之路。”在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本世纪的怀德黑、海德格等真正第一流的哲学家固是如此，中国哲学家自孔孟直至熊十力以下当代几位大儒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当然不是康德般的天才，但我自认是诚挚的哲学探求者，愿借康德自述之语简述个人摸索再摸索，苦思再苦思的内在奋勉与生命试炼过程。我的甘苦经验对于立志以哲学探求为己任的年轻一代或有切磋琢磨、抛砖引玉的教育意义。

二、选走哲学路

我进高中之后开始对于哲学发生兴趣。在高二时偶尔读了日本近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几本论著，如《善的研究》、《思索与体验》、《日本文化的问题》等书，印象特别深刻，因而决意报考台大哲学系。在那时候的台湾，市上多是大陆出版的左派书刊，有关纯哲学的中文书籍很难找到。我自己也只不过看到已故殷海光教授（后来我在台大哲学系与他同事）年少时所写的一本浅显的《逻辑学讲话》与范寿康教授（大学二年级时为中国哲学史一门的老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而已。当我决定报考台大哲学系为第一志愿之后不久（即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台湾新生报专栏读到牟宗三教授的一篇短文《哲学智慧的开发》（此篇后来收在三民文库《生命的学问》一书），读后整个心灵大大受

震撼，也因此彻底坚固了终身以哲学探求为己任的决心。此文所提柏拉图、康德、庄子乃至宋明大儒，那时的我不甚了了，但他所说的哲学气质一点，却深深地打动了少年我的心。后来在台大研究所二年级时，同一寝室的同窗好友刘述先（现任香港中大哲学系讲座教授）带我去郭大春家拜过牟先生一次面之外，我从未有过直接受业的缘分。但是牟先生那篇文章对我日后治学的方向确有决定性的影响。此事我的师友（包括述先在内）与学生都不知道；我只在三年前给牟先生高弟蔡仁厚兄的一封信中稍稍提及而已。总之，牟先生与西田几多郎这两位分别代表中日两国哲学水准的哲学界老前辈，对我个人哲学探求的方向影响至深。如何彻底消化这两位哲学著作，又如何批判地超越他们独创性的哲学理路，一直成为我哲学探求历程上的一大课题。

当我父亲听到我将报考哲学系时，就对我说：“你毕业后想在新竹摆八卦桌，以算命谋生过一辈子吗？”那时的本省同胞几无例外，鼓励子女做医生、工程师或律师。报考文科的已是寥寥无几，想做哲学家的更等于是疯狂。象多半人一样，我父亲也误以命相家为哲学家。后来读庄子书，至应帝王篇壶子向神巫季咸四门示相吓跑这位命相家的一段，拍案叫绝；同时回想以前父亲所说的话，又是感慨万千。

我在高三时，家道已在中落。因为报考台大的旅费无着，只好出售大姐出嫁时留下的老风琴，凑起台币三百元，坐了火车北上台北，从此开始了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生活。

三、大学阶段

从台大哲学系一年级到哲学研究所毕业，我一直是清寒学生，靠几种微薄的奖学金与家教赚来的外快维持了六年学生生活。外在生活虽然如此贫苦，由于哲学这门不著实际的专行是我个人实存的抉择，我在精神上可以说是十分愉快的。那时的我是道道地地的理想主义者，既不考虑毕业之后职业如何，也从未想过留学的可能性，我脑子里充满的是文学艺术的幻想与哲学宗教的玄思。

两位为我扎根的教授

在大学一年影响我最深刻的两位教授，是已故方东美师与中文系的王叔岷师。方师所教的哲学概论，在那几年是哲学系与外文系学生的必修课程。他的讲课极富哲学灵感，有如天马行空，又有启发英才的一种魔力。在知识论，他从詹姆斯的实效论跳到柏拉图的理型论，从柏拉图又转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再从康德往向十九世纪的数理哲学、马赫的感觉主义、量子论、相对论，乃至整套科学的哲学。在形上学，忽尔畅谈柏格森的创化论，忽尔搬出印度奥义书与吠檀多哲学，忽尔描绘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境界，又忽尔提论黑格尔辩证法。方师可以说是善于旷观宇宙人生的美感哲学家，因此论诗境，论艺术，论“乾坤一戏场，生命一悲剧”，他无疑是第一流的大学教师。我从方师所学到的是庐山顶峰展望诸子百家的哲学胸襟与不具我执我见的玩赏能力。方师给我的是一百条哲学道路，我

也只有从这百条道路暗中摸索出自己的一条理路了。老友述先在他一篇《高风亮节怀哲人》中叙述有关方师教书的神情极其生动，又在《中国论坛》近期总论方师毕生的哲学成就，淋漓尽致，都是我所同感又能同意的，我就不必在此详述我们这批哲学系学生从方师如何获益了。

据说已故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亲自规定过，台大新生一律要念孟子(全文)与史记(选读)，用两个学期的国文课修完。我那一年上国文课，与中文、历史二系学生同班，担任教授是以校勘学著名的王叔岷师。王师讲授孟子与史记，义理当然不放过；但可贵的是，他必字字解释，句句析义。我虽不是中文主修，却从他严谨细密的考证训诂作风真正学到了日后攻治中国哲学所必需的专门训练：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缺一不可。也许那时我已隐约感到总有一天会从西方哲学转向中国哲学吧，在王师循循善诱的指导下委实对于中国校勘考据之学下了一番苦功。二年级以后也继续上他的庄子与淮南子两门以及已故屈万里教授所教的诗经与尚书，打下了一点国学的基础。离开大学生活以后，所以一直喜欢翻阅清代乾嘉学派以来直至当代梁启超、于省吾、刘文典、顾颉刚、罗根泽、高亨、张心澂等有关训诂考证方面的国学论著，可以说主要是王师的影响，毕生难忘。我在十一年前开始构想自己的一套哲学方法论，包括“创造的解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就有熔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意图在内。

藉日文钻进哲学知识

二年级以后上过系主任洪耀勋师所讲授的西洋哲学史与印度哲学史，对于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线索开始关心，也了解到

哲学史的研究在哲学探求上的重要意义。台大哲学系特别规定该系学生必修中、印、西三大哲学史，共二十学分。此一规定正确不过。美国大学一般哲学系则无此规定，因此美国的哲学主修学生总抱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印思想不算是哲学了。由于我自幼通晓日文，在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方面的研修方便不少。我那时能够读通文得尔班的《哲学史教本》与《近代哲学史》等西方哲学史的名著，都靠的是忠实畅达的日译本。在印度哲学史方面，我从日本学者的著作获益更多，包括宇井伯寿的《印度哲学史》与六大册《印度哲学研究》，木村泰贤的《印度哲学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学》、《原始佛教思想论》、《小乘佛教思想论》、《大乘佛教思想论》，和辻哲郎的《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等一流论著。我大学时期的英文阅读能力不强，且正开始学习德文，根本无力大量捧读西文书籍。中文方面的哲学书籍又少得可怜，而多半水准很差，我就只有依靠日文哲学书籍增加我的哲学知识了。我这二十多年来研读西方哲学，早已毋需日文著作；但当时的我如果没有哲学系极其丰富的日文图书设备，我在整个大学阶段的哲学探求恐怕要受很大的限制了。

体验了“欲速则不达”

虽然日文书籍帮助不少，真要摸通以概念分析与逻辑推理的方法论步骤擅长的西方哲学，对于当时喜好文学胜过哲学的我来说，处处感到困难重重。记得大一时由于几次无法听懂方师的哲学概论，跑到台大总图书馆借了一本浅显的日文哲学概论书，翻阅几遍，仍搞不通唯心论等专门名词。在大二时，又有一次雄心勃勃地想以急快速度念完天野贞祐日译的康德三大批判书，结果整整花了十天；读后只觉茫然，一无所获。初次

试读康德，真正体会到孔子“欲速则不达”一语在治学上的深意。也同时得到一个宝贵的教训：研读西方哲学名著，必须慢慢咀嚼，依循逻辑思考的步步开展慢慢推敲，慢慢学到随后体验原哲学家从问题设定到发现解决线索整个哲学探求过程的一种思维工夫，这样才有寻获其中诀窍的可能。大二阶段研读康德三大批判书的失败经验，对我日后培养小心细读休姆《人性论》、海德格《存在与时间》、萨特（萨特）《存在与无性》（《存在与虚无》）等等名著的耐性与功力帮助很大。譬如后来我读《存在与时间》的序论部分，摸索了起码十遍，然后再去读结构严密的完整名著，回过头来重读一次序论，忽觉豁然贯通，而手舞足蹈，真是大快我心。我相信任何诚挚而又严肃的哲学探求者都有这种个人体验。

理性与感性间的抉择

我在大三以后逐渐缩小研究范围，兴趣渐从广泛的哲学史凝聚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与齐克果（克尔凯郭尔）与尼采到萨特的实存主义（又称存在主义）。由于我对德国哲学兴趣特浓，自然也开始加强德文阅读能力。起初我对实存主义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文学的阶段，想从文学作品获得实存的感受，做为未来专攻实存哲学的预备工作。在大学最后两年，我对十九世纪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的欧洲文学主要作品与潮流曾下一番苦功。因此之故，我当时怀疑自己可能选错了路，也许应该转向文学。我个性之中理性（哲学探求）与感性（文学感受）强度相等而又相剋，一直困扰我到伊利诺大学获取学位为止。不少朋友都看出我这个特性。譬如在去年朱子大会结束后，仁厚兄从东海大学寄来短函，谓“此番檀岛之聚，觉得兄在会中是理性人，在

会外是感性人，而感性一面之印象特为鲜明。”政通兄、高明教授与赵玲玲来函亦有类似的话语。述先在研究所时有一次就对我说过，我是感性很强的人，也许在文艺方面更会成功。但是我自己隐约觉到，正因为我的感性常常胜过理性而难驯，我非强制自己接受理性的安排不可。就这样我还是勉强走了理性之路直到今天。回顾这三十年来的一番生命的试炼，自觉没有走错了路。中国传统的一阴一阳相剋相成之理，或可用来解释个性扩充成长的生命历程吧。我也有时根据自己个性发展的经验，从较道德实践更为广阔的角度去了解张载以下宋明儒“变化气质”之说。

在大学最后半年，我对雅斯帕斯的实存哲学兴趣大增，就选了他的主著《哲学》三卷的首卷《哲学的世界定位》作为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雅氏主著的第二、三两卷分别题名《实存照明》与《形而上学》。）我这篇毕业论文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粗糙而无创见，不过总算是在中国首次论介雅斯帕斯哲学的长篇了。

用德文再打开一扇门

研究所毕业之前述先还为我特别介绍香港《自由学人》杂志主编李达三先生，把整篇全文登在其中一期，算是我处女作的首次出版。当述先带我去见牟先生时，牟先生认为我懂德日两国语文相当难得，建议我把雅氏主著译成中文。也许我对有创造性的及批评性的哲学思考兴趣较大，始终没有试译过任何西方或日本哲学著作。如从哲学教育的观点去看，我对名著中译的工作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我没有从事于此类工作，做一个哲学教育家颇为内疚。